

论克莱尔·吉根《像这样的小事》中的文化记忆

向丹丹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2日

摘 要

克莱尔·吉根的作品《像这样的小事》通过主人公比尔·弗隆的个人觉醒与身份认同的重塑, 探讨了文化记忆在个体层面如何发挥作用, 尤其是通过抹大拉事件这一历史背景, 揭示了文化记忆如何影响个体的选择与身份建构。小说通过对修道院的隐性呈现与社会沉默的叙述, 展现了文化记忆在日常生活中的沉积与再现。

关键词

文化记忆, 《像这样的小事》, 克莱尔·吉根

A Study of Cultural Memory in Claire Keegan's *Small Things Like These*

Dandan X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September 2, 2026; accepted: October 13,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2, 2026

Abstract

Claire Keegan's *Small Things Like These* examines the role of cultural memor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rough the protagonist Bill Furlong's personal awakening and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gainst the historical backdrop of the Magdalene Laundry, the novel reveals how cultural memory shapes individual choices and identity formation. Through the implicit portrayal of the convent and the pervasive social silence, Keegan illustrates how cultural memory accumulates and resurfaces in everyday life.

Keywords

Cultural Memory, *Small Things Like These*, Claire Keega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代小说家克莱尔·吉根(Claire Keegan) 1968 年生于爱尔兰威克洛(Wicklow), 自 1994 年起投身短篇小说创作, 其文风素以冷峻简约著称, 在细腻的文笔中映照出尖锐的社会现实。2021 年, 她最新推出的短篇小说《像这样的小事》(*Small Things Like These*)入围 2022 年布克奖短名单, 标志着其创作生涯的又一高峰。现有研究多从抹大拉洗衣房的历史创伤、天主教制度批判、性别政治与叙事伦理等角度切入, 对小说中的记忆机制, 尤其是代际传递与“交往记忆”的差异关注不足。本文以文化记忆理论为框架, 借助扬·阿斯曼的“交往记忆”概念, 考察小说如何通过比尔的个人觉醒与身份重构, 揭示文化记忆在个体层面的作用机制, 并尝试辨析小镇不同代际对修道院的态度, 以明确本文的切入点与贡献。

小说以比尔·弗隆(Bill Furlong)经历的一桩“小事”为切口, 借明暗两条叙事线索, 将内心独白与外在行为决策并置, 揭示文化记忆在个体认同与道德抉择中的深层效力: 它并非对历史的被动回溯, 而是在现代虚无境遇中重寻人性意义与伦理坐标的能动过程。比尔起初并未直接意识到抹大拉事件对其自我认知的冲击, 而是在追索生父之谜、感念母亲艰辛、履行家庭责任与教养子女, 以及反思小镇集体沉默中, 逐步察觉被压抑、被悬置的文化记忆始终潜藏于文化深层结构, 终因时代变迁而破土萌发, 唤醒良知, 重塑道德感知与行为范式。本文进一步指出, 小镇居民对修道院的态度存在代际差异: 年长一代以回避与共谋维系沉默, 中年一代在模糊传闻与道德不安间摇摆, 年轻一代则因记忆传递断裂而疏离无知。经由记忆的延展与重构, 吉根不仅探讨文化记忆如何形塑集体身份认同, 更凸显其如何透过个体选择与行动, 重新锻造对历史的理解与道德责任担当。比尔对母亲的追怀、对修道院紧闭门后真相的叩问及最终的精神觉醒, 正是文化记忆在个人心灵中延续、转化并焕发道德力量的生动写照。

2. 记忆的场域: 修道院与小镇空间

记忆研究最初主要集中于心理学领域, 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Frederic Bartlett)在 20 世纪初通过实验揭示了记忆过程受个体态度、信仰及社会因素的影响[1]。他强调, 记忆并非单纯的信息存储和提取, 而是在社会环境中不断建构和重构的动态过程[2]。这一研究深刻影响了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促使其在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理论。哈布瓦赫认为, 记忆不仅是个体的心理活动, 更是社会构建的结果[3]。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哈布瓦赫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 [4]。

扬·阿斯曼(2011) [4]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强调, 记忆不仅仅是个体经验的存储, 而是在特定社会框架下被构建、传承并塑造的集体现象。它通过文本、仪式、象征和空间结构等方式在群体中得以延续。

“文化记忆”理论的出现, 将记忆研究拓展到历史、哲学和社会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范围中。他认为, “文化记忆”具有集体(民族)同一性建构功能, 其机制主要在于人们借助“文化记忆”可以对“我们应当记住什么”或“我们绝不能忘记什么”的问题作出回答, 而这种答案意味着一个集体对于共同生活的世界和

规则的基本共识,因此,尽管不同国家都有着不同的习俗和文化,但是烙印在国家民众内心深处的记忆,是文化的记忆,也是对人性的呼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同一性奠基于共同的“文化记忆”之上,因而“民族认同及其稳固持久性受制于‘文化记忆’及其组织形式。民族的消亡,不是有形物质的消失,而是在集体、文化层面上的遗忘”([4]:p.168)。因此,积极地探寻文化记忆的记号,试图正视历史的印记,直面文化记忆,从中剖析人性的深意,才能更好地找到集体道德的归属地。

因此,文化记忆在《像这样的小事》中的作用,正是通过比尔·弗隆对历史边缘机制的文化记忆追溯,展现出他对个人道德责任的重新审视,及个体与社会如何在记忆的交织中相互塑造身份。通过克莱尔细腻叙事,呈现了文化记忆如何在历史长河中被唤醒,更深刻地作用于个体的自我认知与身份重构,尤其是在面对遗忘与重塑时,个体如何通过回溯记忆来完成自我救赎,在文化记忆中获取文华深层结构的内涵。

2.1. 个人创伤与文化记忆的重叠

在克莱尔·吉根的《像这样的小事》中,文化记忆作为文中暗藏的行文主线,它不仅影响社会对历史的认知,也深刻塑造了主人公的个体身份认同。比尔·弗隆的成长经历很好地体现了文化记忆如何在个体层面影响道德选择。比尔的一生充满了隐秘的伤痕与身份的探寻,其成长经历远非表面所见的平稳与顺遂,文中主线是比尔现实内心的成长,穿插着暗线是比尔过去记忆的追寻。在他的生命中,母亲是唯一的亲密依靠,承担了他全部的情感寄托。与此同时,威尔逊夫人作为一位无子嗣的寡妇,却展现出极大的宽容与无私,她不仅接纳了年仅十六岁便未婚生子的比尔的母亲,还在社会排斥与道德审判的阴影下,为母子二人提供了庇护。威尔逊夫人不仅是比尔成长过程中的养育者,更通过其慈爱与正直的品格,塑造了一个道德引导者的形象。在比尔遇见莎拉并试图救助她时,威尔逊夫人无私的形象深深影响了他,促使他在行动中效仿她的精神。在记忆的回溯中,比尔重新塑造了自己的身份,他从威尔逊夫人那里汲取的道德力量,既成全了他对他人的救助,也完成了自我认知与成长。

比尔的生命历程始终伴随着对“父亲”形象的探寻,这一主题构成了小说的隐性叙事线索。文本多处暗示,比尔的生父可能是某位社会地位显赫之人,并且可能为他留下了一笔巨额遗产。然而,随着情节推进,比尔逐渐意识到,真正对他怀有特殊情感并在其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或许是守门人内德(Ned)。尽管小说并未直接揭示比尔父亲的真实身份,但作者通过层层铺垫,使读者在文本细节的拼接中,自行勾勒出潜在的答案。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增强了文本的含蓄性,也强化了比尔身份认同危机的主题,使其在文化记忆的层面上,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产生呼应。

2.2. 隐匿的记忆与具身化再现

文化记忆的运作往往伴随着社会的制度性遗忘与合谋。吉根避开了宏大的历史控诉,而是将叙事重心置于具有强烈感官张力的关键空间,使记忆的压抑与觉醒在微观细节中爆发。这些叙事重心的偏移不仅深化了个体身份认同、文化记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也使小说的主题更加饱满。此外,它们在叙事中构建了多层次的意义结构,不仅烘托了比尔的心理成长轨迹,更凸显了其在文化记忆中不断醒悟,最终获得道德觉醒与身份重塑的历程。

小说开篇,作者用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冬景描绘来奠定叙事氛围。这一描写不仅生动再现了冬季的严酷气候,也象征性地暗示了小镇居民对现实的回避与无奈。小说开篇极具冲击力的冬景描写,不仅再现了严酷的自然气候,更象征着小镇居民对体制威压的回避与顺从;这种对冰冷环境的麻木忍受,折射出社会在面对修道院罪恶时的集体缄默与道德缺位。然而,严冬在隐喻停滞的同时亦蕴含着复苏的转机,比尔冲破社会阻力施救莎拉的轨迹,恰与这层严酷物象形成了鲜明张力。冬天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冰封,

也象征着道德责任的缺失。然而，尽管冬季往往象征着停滞与严寒，它同时也是新生前的过渡期。在这一季节的沉寂与冷漠之下，仍然蕴藏着变革与觉醒的可能。比尔的成长轨迹正是在这严寒之中完成的：他从最初对修道院仅存的怀疑，到最终冲破社会沉默，冒着寒冷拯救女孩莎拉，这一过程与冬季的象征意义形成鲜明对照。在此基础上，小说将圣诞节作为核心时间线索与伦理试金石。这一本应代表博爱与救赎的节日，与小镇粉饰太平、放任女孩遭受折磨的冷漠现实构成了强烈反讽。吉根借助这一反差，使比尔的行动超越了传统的世俗庆祝：他甘愿承受现实代价、牵引莎拉走向光亮处的抉择，不仅是对一名受害者的实体救助，更是一次打破历史遗忘之墙的肉身见证。由此，圣诞节的象征意义从表层的家庭温情，升华为对群体共谋的深刻质问，展现了个体在文化记忆的迷局中对失落良知的真正召唤。

在小说中，修道院不仅是实体建筑，更是承载着社会规训与历史压抑的文化记忆象征。其物理上的封闭隔离，隐喻着体制对创伤真相的系统性遮蔽。比尔在修道院煤棚中发现被囚女孩莎拉，构成了全书最核心的叙事转折与记忆觉醒契机。吉根在此处运用克制而具身化的感官细节：冰冷潮湿的煤灰、女孩冻伤发红的肢体以及对水源的急迫渴求。煤棚这一“废弃与储能”的边缘空间，精准折射出抹大拉洗衣房在爱尔兰社会记忆中的真实生态，它正是洁净表象下被刻意掩埋的污秽与沉重代价。

更深层的张力在于文本呈现的“再记忆”过程。莎拉瑟缩的躯体如同一面镜子，借助蒙太奇式的心理跃迁，瞬间唤醒了比尔关于生母边缘处境的创伤记忆。倘若没有当年威尔逊夫人的庇护，其母亲亦难逃被制度吞噬的命运。抽象的历史暴力在这一刻具象化为莎拉脚上的冻疮，微观的肉体痛感撕裂了宏大的集体失忆。比尔由此从被动的目击者转变为主动的“再见证者”，他在个体意识中打捞沉沦的历史，最终在行动中完成了对遮蔽机制的反叛与对文化记忆的批判性重构。

3. 记忆的压抑：社会沉默的权力机制

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边缘机制是社会文化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在主流话语中长期被压制，但其隐性影响依然深刻地渗透在社会结构之中。在克莱尔·吉根的《像这样的小事》中，这一制度性规训现象作为隐性符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镇居民的集体记忆，并塑造了社会对该类现象的刻板印象。

3.1. 边缘机制的文化记忆

这类机制的命名往往源自早期宗教文献中的特定人物，但该名称原本并非姓氏，而是指代某地理位置，据说位于现今的以色列北部([5]: p. 77)。在历史演变中，该词逐渐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贬义，最初旨在收容所谓的“堕落女性”(Fallen Women)。该模式始于十八世纪的英国，起初由特定教派设立，随后其他教派也纷纷效仿。宗教认同是爱尔兰社会文化特征之一，特定教派在人口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5]: p. 58)。起初，这类机构是一种具有慈善救助性质的社会收容场所，霍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等英国作家曾将其浪漫化([5]: p. 78)。

在爱尔兰，此类运作模式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它不仅存续时间最长(1767年至1996年)，且在爱尔兰独立后(1921年)其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独立初期的爱尔兰社会高度依赖天主教会来维系道德秩序，遂由最初的慈善机构演变为监禁性机构，成为国家维护社会道德规范的重要手段。在这一体系下，被关押的女性完全丧失人身自由，被迫长时间从事繁重的洗衣劳动，其中许多人终其一生未能离开洗衣房。弗朗西丝·芬尼根(Frances Finnegan)是最早全面研究该机制的历史学者之一，她指出被关押的女性包括妓女、未婚母亲、从工业学校转来的孤儿、智力或肢体有缺陷的女性，以及被认为是“诱惑对象”(object of temptation)的女性([5]: p. 79)。

3.2. 文化记忆的再现

尽管该机制的历史曾被长期遮蔽，近年来，随着受害者群体的公开发声和学界的研究推进，爱尔兰

政府被迫承认其历史责任。2013年2月,时任爱尔兰总理恩达·肯尼(Enda Kenny)在议会中正式代表国家向该机制的受害者道歉,并承认国家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责任。在致歉演讲中,他表示:足足有90年了,爱尔兰对这些女性和她们的经历完全置之不理,不管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这都曾是一个残酷、缺乏同情心的爱尔兰,毫无慈悲可言……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你们(受害者)曾经独自承受这个国家的可怕秘密,无论是在家里独自默默承受,还是代表爱尔兰和爱尔兰人民将这个秘密带到英国、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但是从这一刻开始,你们不用再承受了,因为今天,我们要把它拿回来。今天我们承认国家对你们的苦难负有责任([5]: p. 97)。

肯尼的这段话表明,构建关于文化记忆的问题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意义。一是与过去的联结:受害者年事已高,必须将她们的经历和证言写入历史和文化记忆中;二是从空间上讲,爱尔兰人历来流散海外,许多因该机制而受难失去母亲的孩子也被卖到美国,成年后渴望找到母亲,这些流散的爱尔兰人也应该获得关于这段往事的记忆。

在书的结尾按语(A Note on the Text)中,以直接且醒目的方式揭示了该历史事件的罪恶,以此警示人们正视过往,直面文化记忆的印记。她在按语援引具体数字,揭示受害者规模之巨大,进一步强调了文化记忆的重要性:“说一万人已是低估,三万人恐怕才更准确。那些大多数记录,不是被付之一炬,就是下落不明,抑或被刻意封存,无从查考。”(“Ten thousand is the modest figure; thirty thousand is probably more accurate. Most of the records from the Magdalene Laundries were destroyed, lost, or made inaccessible.” ([6]: p. 52))这段话不仅展现了历史记录消失和湮灭,也凸显了文化记忆在再现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即在遗忘与消除的历史叙事中,如何重构并保存真实的记忆。

从更广阔的文化视角来看,爱尔兰社会对于历史与文化记忆的态度并非选择逃避,而是倾向于面对与接受。这种态度体现出爱尔兰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文化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进一步分析了爱尔兰文化认同的二重性,一方面,爱尔兰社会渴求“寻根、从属、传统”;另一方面,又沉迷于“流放、扩散、全球性、流散”的文化体验([7]: p. 65)。这种文化认同的流动性使得“爱尔兰性”(Irishness)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被重塑,呈现出一种既深植于历史传统,又不断向外拓展的身份认同模式。而在这一动态建构过程中,文化记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连接着爱尔兰的历史真实,使民族认同得以延续,同时也作为承载集体经验的媒介,展现出爱尔兰文化向外开放的包容性与多元性。通过文化记忆的再现,爱尔兰社会在面对历史创伤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位置,在全球语境中寻求身份认同的再定义与再塑造。

4. 记忆的唤醒:个人史与公共史的交汇

文化记忆在个体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文化记忆研究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指出,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简单存储,更是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它在个体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扮演着重建与延续的双重角色:“记忆的另一个功能,即重建,以连续性的中断为前提。一种持续性在深层结构的储存总得到实现,它使今天表现为昨天的延续并使二者无法分离”([2]: p. 20)。

在《像这样的小事》中,虽未被直接公开讨论这类历史问题,但通过社会沉默、集体遗忘和象征性空间(如修道院和圣玛格丽特女子学院)得以存续。小镇居民普遍知晓修道院的存在,却选择对其中发生的事情保持缄默。这种社会性的“选择性遗忘”(Selective Forgetting)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记忆机制,它不仅抹去了受害者的真实经历,也通过话语建构合理化了社会的遗忘行为。克在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关于那个地方,还有别的议论。有人说,培训学校的女孩子们……根本算不上什么学生,而是些名声不佳的姑娘,整日接受改造,靠清洗脏衣物上的污渍来做补赎。”(“There was other talk, too, about the place. Some said that the training school girls...weren't students of anything, but girls of low character who spent their days being reformed, doing penance by washing stains out of the dirty linen...” ([4]: p. 18))这一段话表明,通过对修道院女性群体的污名化,将她

们塑造成“名声不佳的女孩”，从而掩盖其真实的受害者身份，社会集体记忆往往受权力结构的影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被选择性地保留、遗忘或扭曲，以维系主流社会的道德规范与秩序。

文化记忆不仅塑造个体的身份认同，也在社会道德判断中发挥着复杂的双重作用。文化身份“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是特定文化中的主体对自己文化归属和文化本质特征的确认” ([8]: p. 120)。在比尔试图帮助莎拉逃离修道院的过程中，他不仅挑战了社会的沉默机制，也经历了对自身道德信仰的深刻考验。他的行动象征着文化记忆在个体层面的重新激活，使他摆脱了社会规训的束缚，成为敢于直面历史与现实的道德行动者。他最终完成了自我身份的重构，从一个顺应社会规则的普通商人，转变为敢于挑战社会沉默的道德行动者。这一身份重塑不仅体现了他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也展示了文化记忆如何在个体层面发挥塑造作用。比尔最终做出的抉择，不仅是对莎拉的拯救，更是对自我的认同与确认。在整篇小说中，他始终处于社会沉默与自我挣扎之间，而在结尾处，他终于突破这一禁锢，喊出了莎拉的名字：“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家了，萨拉。” (“You’ll come home with me now, Sarah.” ([6]: p. 49))，这也代表着他喊出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呼唤不仅是对眼前女孩身份的承认，更是对自身存在的确认。他不再是那个被社会边缘化、在道德困境中踌躇不前的人，而是一个敢于直面历史、承担道义责任的个体。

在此刻，比尔不再隐姓埋名，不再逃避自身的身份。他的声音穿透了历史的沉默，也穿透了社会的压抑，将被遮蔽的个体记忆重新带回现实。他的这一举动不仅意味着个人身份的确立，也代表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对被历史压制者的承认，对自身身份的接纳，以及对更广义的民族记忆的回应。克莱尔·吉根在这部作品中深刻“体现了对爱尔兰身份的文化关怀，关注在此冲击之下当代爱尔兰人如何在调整自我、顺应历史潮流的同时保有传统的爱尔兰身份认同。他们通过小人物的生活抒发对过去的追忆，在今昔对比中暗藏对现代化的反思和对爱尔兰身份的思考” ([7]: p. 66)。

5. 结论

克莱尔·吉根在《像这样的小事》中，借由比尔·弗隆的道德抉择，考察了文化记忆与个体伦理认同的互动机制。小说并未直接展现历史事件的制度性暴力，而是通过封闭空间与小镇社群的群体缄默，揭示了权力话语对创伤历史的遮蔽与规训。弗隆对莎拉的援救，实质上是边缘主体将受抑的个人创伤转化为公共见证的过程，证实了个体记忆在瓦解集体失忆时的抵抗潜能。

该文本的现实意义在于映射了“后天主教时代”爱尔兰的认同重构：在教会神权祛魅之后，社会必须直面过往的共谋事实，在道德反思中重建主体性。此外，题旨“小事”蕴含着深刻的微观伦理学价值，即面对体制性压迫与宏大历史创伤，形而上的抽象批判难以提供有效的干预途径；正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承担现实代价的切实行善，构成了消解冷漠秩序与实现历史疗愈的真正基础。

参考文献

- [1] Bartlett, F. (1998) *Memory: A Social an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Research*.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 [2] 王蜜. 文化记忆：兴起逻辑、基本维度和媒介制约[J]. 国外理论动态, 2016(6): 8-17.
- [3] Halbwachs, M. (2002) *On Collective Memory*. Shanghai People’s Press.
- [4] Assmann, J. (2015)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5] 李元. “让我们看见这棵树”：爱尔兰抹大拉洗衣房的文化再现与假性记忆[J]. 外国文学评论, 2022(2): 76-98.
- [6] Keegan, C. (2021) *Small Things Like These*. Faber & Faber.
- [7] 刘常轩. 再现还是重构？——当代爱尔兰小说中身份问题探微[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18(1): 57-66.
- [8] 何林. 叶芝与爱尔兰文化身份的建构[J]. 当代文坛, 2010(4): 120-123.